



汉语言文学研究文库

跨文明文学理论 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研究

靳义增 等 著

Research on Heterogeneity and Variability
of Literary Theory across Civilizations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汉语言文学研究文库

教育部2011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跨文明文学理论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A751028）资助

跨文明文学理论 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研究

靳义增 等 著

Research on Heterogeneity and Variability
of Literary Theory across Civilizations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教育部 2011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1YJA751028)的最终研究成果。本书从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入手,探讨“理论旅行”与文论“变异”。尽管跨文明文论交流存在困境,但只要跨文明文论对话坚持话语独立和平等对话原则,通过“不同话语与共同话题”、“不同话语与相同语境”等具体途径,仍然可以实现跨文明文论的相互交流与交融。本书从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和弗朗索瓦·于连的《迂回与进入》两部西方学者的著作入手,探讨文论的变异性问题。在借鉴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论证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基本条件与路径选择,并从文艺思想、文艺思潮、文论范畴、创作心理机制、叙述技法等方面展开跨文明文论之间的对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明文学理论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研究/靳义增等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8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5680-1685-8

I. ①跨… II. ①靳…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3706 号

跨文明文学理论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研究

靳义增 等著

Kua Wenming Wenxue Lilun de Yizhixing yu Bianyixing Yanjiu

策划编辑:周小方 杨玲

责任编辑:李瑞

封面设计:原色设计

责任校对:曾婷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3

录排:武汉正风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武汉鑫昶文化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2.75 插页:2

字数:251千字

版次:201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39.8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汉语言文学研究文库



Research on Heterogeneity and
Variability of Literary Theory across Civilizations

南阳师范学院学术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

序言



自我于1995年提出文论“失语症”以来,学界对此进行了近二十年的讨论,该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热点。但提出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为了解决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我们又提出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基本路径,这两条路径实质上就是古今对话和中西对话的问题。古今对话是文化同源性基础上的时间差异,中西对话是异质文化基础上的空间差异。相对来讲,通过中西对话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难度更大一些。因为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是完全异质性的文论,这种异质性不仅在于知识谱系、思维方式、概念范畴、表达方式的不同,更在于文化的非同源性、异质性。

在跨文明语境下,中西方文论是否具有可比性?这是涉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基础性问题。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上讲,法国学派认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基础是文学现象间可实证的同源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三大理论支柱——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美国学派的理论是对法国学派的纠正,他们恢复了比较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跨学科研究,但其理论的基本立足点也在于求同,他们提出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可比性基础仍在于类同性。美国学者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说:“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美国学派对于把比较文学“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的跨文明研究持怀疑态度。在全球化、跨文明语境下,比较文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突破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理论束缚。

基于中国学者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东西方不同文明的碰撞与冲击的事实,我在2005年又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在《比较文学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我专列一章来讨论文学变异学,我把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主题学、文类学、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等纳入变异学的研究范围。四川大学吴兴明教授在与我一起去深圳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年会的飞机上,首次听我讲到变异学的时候就想到:是否可以用“理论旅行”来支持变异学的

命名？或者是否可以说“理论旅行”的现象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命名为“变异学”的重要根据？按照这一思路，吴兴明教授发表了《“理论旅行”与“变异学”——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立场或视角的考察》（《江汉论坛》2006年第7期）。当时，靳义增是我的博士生，也比较积极地参与“变异学”的研究，发表了《从变异学视角看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基本路径》（《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5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2007年我申请并获批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研究”，该项目研究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把异质性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可比性提出来，也就是说把比较文学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异质性的基础上，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一个新的重要理论转折。以变异学理论为支点，就可以解决跨文明文学与文论比较的理论基础。

靳义增全程参与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研究”项目，应该说对我提出的变异学理论非常熟悉，博士毕业后，他又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南阳师范学院工作，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跨文明文论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1期）等论文。2011年，他申请并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跨文明文学理论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研究”，《跨文明文学理论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研究》一书就是这一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

我认真地看了这部书稿，认为其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突破性和理论价值。譬如，第三章第二节从中国古代屈原阐释的发展历程总结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应从“新文化语境的生成”和“新的话语运用方式”两方面努力；第五章从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和弗朗索瓦·于连的《迂回与进入》两部西方学者的著作入手，探讨西方学者对中国文论的变异；第六章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基本条件和路径选择进行讨论；第八章、第九章展开的阿多诺的“反艺术”与庄子的“法天贵真”的文艺思想对话、法国古典主义文论与中国复古主义文论的文艺思潮对话、虚静与直觉的文论范畴对话、“自由联想”与“兴”的创作心理机制对话、“常山之蛇”与“巴尔扎克之蛇”的叙述技法对话，都显示出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创新价值。在项目结项与论著将要付梓之际，靳义增托我作序，师生之情甚厚，奖掖后学也是不容推辞之责。是为序。

曹顺庆

2016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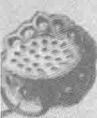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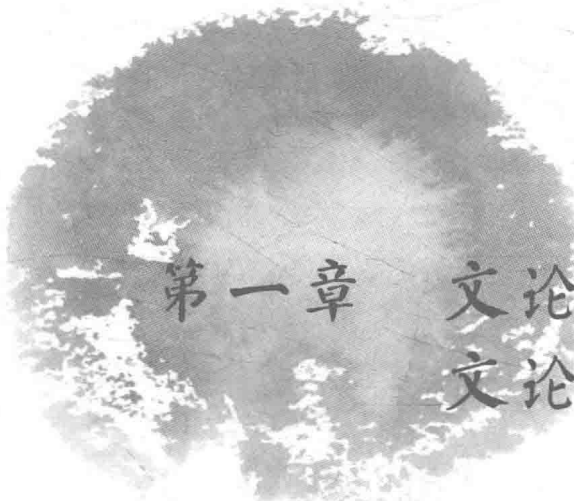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文论“失语症”与文论“变异”	(1)
第一节 文论“失语症”:异质性的丧失	(1)
一、文论“失语症”的提出与讨论	(2)
二、文论的异质性	(7)
三、文论“失语症”的实质:异质性的丧失	(9)
四、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12)
第二节 “理论旅行”与文论“变异”	(14)
一、“理论旅行”的提出	(15)
二、接着“理论旅行”说的“变异”理论	(17)
三、文学理论在“理论旅行”中的变异现象	(22)
第二章 跨文明异质文化交流的困境与原因	(27)
第一节 跨文明异质文化交流的困境	(27)
一、文化异质性带来的文化立场错位使异质文化交流出现对立	(28)
二、同一概念的不同认知使异质文化交流缺少对话交流的空间	(31)
三、不平等的文化对话造成强势话语的“独霸天下”	(34)
第二节 跨文明异质文化出现交流困境的原因	(36)
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成见使异质文化交流出现对立	(36)
二、前理解对概念的不同阐释使异质文化交流缺少对话的空间	(38)
三、话语不平等使异质文化对话变成强势话语的“独霸天下”	(40)
第三章 佛教中国化与屈原阐释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启示	(43)
第一节 从佛教中国化到西方文论中国化	(43)
一、从中国文化佛教化到佛教文化中国化	(44)
二、从中国文化西方化到西方文化中国化	(45)
三、中国文论西方化	(46)
四、西方文论中国化	(49)
五、中国文论西方化与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根本区别	(52)

第二节 屈原阐释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启示	(54)
一、贾谊、刘安、司马迁阐释屈原:道家文化语境与消解性话语模式	(54)
二、扬雄、班固、王逸阐释屈原:儒家文化语境与解经话语模式	(55)
三、刘勰阐释屈原:玄学文化生成与思辨话语模式	(56)
四、王国维阐释屈原:中西文化汇通与审美话语模式	(58)
五、中国文学理论建设:新文化语境的生成和话语方式的运用	(59)
第三节 西方文论预设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	(60)
一、西方文论预设了建构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	(60)
二、西方文论置换了中国文论的概念范畴	(63)
三、西方文论限制了中国文论的表达方式	(66)
第四章 跨文明文论交流的基本规律	(69)
第一节 跨文明文论交流的他国化与本土化规律	(69)
一、跨文明文论交流的他国化规律	(70)
二、跨文明文论交流的本土化规律	(73)
第二节 跨文明文论交流的变异性规律	(76)
一、文明的冲突与差异是当今世界学术发展的前沿问题	(76)
二、跨文明文论交流的变异性规律	(78)
第三节 跨文明文论交流的最终目标:对文学共同规律的追求	(83)
一、从本土文学到世界文学	(83)
二、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学选择	(86)
三、跨文明文论交流的最终目标:对文学共同规律的追求	(91)
第五章 跨文明文论交流的变异性举隅	(96)
第一节 《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对中国文论的变异	(96)
一、知识谱系:零散性文论与系统化的规整	(96)
二、概念范畴:模糊性文论与明晰化的界定	(99)
三、表达方式:隐喻性文论与科学化的解读	(102)
第二节 迂回的“变异”:以《迂回与进入》为例	(105)
一、意义的形成:哲学的与智慧的	(105)
二、意义的表述:直接的与迂回的	(108)
三、迂回的意义:反观的与融通的	(112)
第六章 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基本条件和路径选择	(117)
第一节 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基本条件	(117)
一、文化适应性	(117)
二、文学适应性	(119)

三、文论适应性	(121)
四、需要适应性	(123)
第二节 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路径选择	(126)
一、异质文化交融,激发文论新质	(126)
二、异域文论相似,互相启发阐释	(127)
三、创造性误读异质文论	(130)
第七章 跨文明文论的对话与激活	(134)
第一节 跨文明文论对话的原则与途径	(135)
一、跨文明文论对话的原则	(136)
二、跨文明文论对话的具体途径	(138)
第二节 跨文明文论对话,激活文论新质:以“妙悟”为例	(142)
一、妙悟是中印文化因子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诗学话语	(142)
二、妙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思维方式	(145)
第八章 中西方文艺思想与文艺思潮对话举例	(152)
第一节 文艺思想对话:阿多诺的“反艺术”与庄子的“法天贵真”	(152)
一、“反艺术”:反对“同一性”的艺术与反对人为的艺术	(152)
二、理想的艺术:现代艺术和天然艺术	(155)
三、理想艺术的实现:凌乱破碎的图景与虚静物化的状态	(158)
第二节 文艺思潮对话:法国古典主义文论与中国复古主义文论比较	(160)
一、法国古典主义文论与中国复古主义文论的异质性	(161)
二、法国古典主义文论与中国复古主义文论在生成条件上的可通约性	(163)
三、法国古典主义文论与中国复古主义文论在理论形态上的共同性	(165)
第九章 中西方文论范畴、创作心理机制与叙述技法对话举例	(168)
第一节 文论范畴对话:虚静与直觉	(168)
一、虚静和直觉体现了思维活动的物我不分性	(169)
二、虚静和直觉体现了思维活动的直观体悟性	(171)
三、虚静和直觉体现了思维活动的超越功利性	(173)
第二节 创作心理机制对话:“自由联想”与“兴”	(175)
一、“自由联想”是创作主体自由自主的意识活动	(175)
二、“兴”是创作主体连绵不断的意识流动	(176)
三、“兴”的“联想地想象”与“自由联想”是相通的	(178)



第三节 叙述技法对话：“常山之蛇”与“巴尔扎克之蛇”	(180)
一、整一性与圆整性	(181)
二、时间性与空间性	(182)
三、实现效果与表达主题	(184)
四、线性思维与圆形思维	(185)
参考文献	(186)
后记	(195)



第一章 文论“失语症”与 文论“变异”

21 世纪是一个文化交往与文化对话的时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对话已经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在文化对话的时代,中国既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又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对话原则,要全面认识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上,学界提出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中西文论对话”、“西方文论中国化”等命题,但是,无论是“现代转换”、“中西对话”,还是“西方文论中国化”,都必须建立在我们对中国和西方文化、文论深入研究与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都必须充分意识到中西方文化与文论是两种在根本性质上不同的文化与文论。对中西方文化与文论异质性的深刻理解,是我们展开对话并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基础和前提。本章主要论述“文论‘失语症’:异质性的丧失”和“‘理论旅行’与文论‘变异’”两个问题。

第一节 文论“失语症”:异质性的丧失

之所以要讨论文学理论的异质性与变异性问题,是因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理

论的发展遇到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失语症”。黄曼君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曾专门讨论了中国当代文论“失语”与“话语重建”问题,他把“失语”与“话语重建”列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基本问题。^①正是由于“失语”,才需要“话语重建”,才需要重建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那么,“失语症”是如何提出来的?经过了哪些讨论?“失语症”的实质是什么?本节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论述。

一、文论“失语症”的提出与讨论

文论“失语症”这一论断是曹顺庆先生在1995年提出来的。他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文论失语症!”他说:“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②

曹先生的这一论断实际上是对世纪之交文论界一种呼声的高度概括。早在1987年,毛时安在评论当时文学理论的状况时就说:“我们现在的大体状况是,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别人有的我们都开始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没有。我们留给这个时代的最终可能是‘贫乏的理论,因为那不是我的’。”^③季羨林先生在1995年也很有感触地指出:“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④与此同时,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学者对当代中国文论的不景气状况也颇有同感,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教授就十分感慨地说:“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20世纪是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尽管中国的科学家有多人得过诺贝尔奖,中国的作家却无人得此殊荣,中华的文评家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⑤孙津讲得更加明白:“中国没有理论,这是我说的,至少现在是这样。当我们要用理论来讲话时,想一想罢,举凡能够有真实含义的或者说能够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到底有几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过来)。如果用人家的语言来言语,什么东西可以算得上中国自己的呢?”^⑥曹顺庆先生把这一现象归结为文论“失语症”,并把它视为“一种严重的文化病态”^⑦。

① 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819—821页。

②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③ 毛时安语,见《批评家》1987年第3期。

④ 季羨林:《东方文论选·序》,载《比较文学报》1995年第10期。

⑤ 黄维梁:《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载《比较文学报》1995年总第11期。

⑥ 孙津:《世纪末的隆重话题》,载《文艺争鸣》1995年第1期。

⑦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文论“失语症”被提出之后,在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季羨林先生认为:“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①罗宗强先生认为“失语症”问题的提出,“确实反映了面对现状寻求出路的一个很好的愿望。因它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②。童庆炳先生认为,1949年以来中国文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50年代的学习苏联时期,60—70年代的“反修批修”时期,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三个时期中国的文论发展是很不相同的,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搬用外来的东西或教条式的东西,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我们基本上还没有建立起属于中国的具有当代形态的文学理论。我们只顾搬用或只顾批判,建设则‘缺席’,中国具有世界‘第一多’的文学理论家却没有自己一套‘话语’,这不能不使我们陷入可悲的尴尬局面。”^③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失语症”提出了种种反对意见。学界对“失语症”话题进行了近二十年的讨论,这从侧面反映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下面我们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来梳理学界对文论“失语症”问题的讨论情况。

一是把“失语症”视为“文化原教旨主义”或“文化复仇情绪”,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周宪先生和熊元良先生。周宪先生主要是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复杂关系中来思考“失语症”问题,在他看来,全球化与本土化并不是绝对二元对立的关系,我们没有必要在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时候,急切地进行本土化,急切地寻找自己“正宗的民族文化”和“纯粹的本土文化”。他认为,“失语症”这种主张“实际上带有某种程度的潜在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倾向。因为这种理论在其弘扬文化民族传统的口号下,暗含了一种对文化的民族或种族纯粹性的追求”^④。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以传统的方式来解释和捍卫传统,维护文化乃至种族的纯粹性。”“文化原教旨主义是用传统来捍卫传统,用传统的方式来解释传统,它拒绝一个多元的文化,也拒绝任何发展和变化,甚至还拒绝与世界对话。”^⑤他由此得出结论:“失语症”的失误在于“以传统来解释、定义和捍卫传统,而不把传统本身看作一个发展的变化的范畴”,在于“它以一种静止的凝固不变的方式来界定传统”。^⑥应该说,文化原教旨主义的说法是在不理解“失语症”含义的基础上乱扣帽子。“失语症”的提出者并没有捍卫文化的民族性和纯粹性,也并不认

① 季羨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② 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载《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③ 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7页。

④ 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⑤ 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

⑥ 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



为传统是一成不变的。曹顺庆先生早就指出：“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工作中，我们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努力目标，就是‘融汇中西，自铸伟辞’，希望通过对传统话语的清理、中西对话研究而激活中国固有的文论精神和话语能力，在‘杂语共生’的局面中广取博收，逐步建立起既扎根于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又适合于当代文学实践的中国文论新话语。”^①既然是“融汇中西”、“中西对话”、“杂语共生”，怎么能够将“失语症”理解为“捍卫传统”、“文化原教旨主义”呢？与周宪先生的文化原教旨主义相似的是熊元良先生把“失语症”视为“文化复仇情绪”。熊先生认为，“失语症”是“中国的后殖民理论批评”的典型代表，是“力图立足中国传统，建构一套本土性话语体系，想以此来抵抗西方的话语权威，从而实现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对话语权的争夺”^②。难道说“立足中国传统”的话语重建是错误的吗？只有依靠西方文化才不算“文化复仇”吗？

二是认为中国文艺学从古代到现代只是发生了转换而没有从“根”上断裂，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高楠先生。在高楠先生看来，“中国文艺学的根便是中国文化的人伦特质，表现为人伦本体的价值观、知行统一的实践理性以及整体性思维方式”。由于“此‘根’规定了中国文艺学的民族文化特征”，所以西方文论进入中国后大都被中国文艺学同化了，“本世纪的文艺学转换中，思想总是被及时地组织为话语，话语也总是被及时地转化为思想。中国文艺学始终在说着历史要求它说的话，时代要求它说的话，它说出了自己的思想理论，它并未‘失语’”。^③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以偏概全的不足，缺乏对问题的具体分析。中国文艺学的“根”没有断，主要体现在如钱钟书先生、季羨林先生、杨明照先生、宗白华先生等少数学识渊博、融汇中西的学者身上，而在大部分青年、中年学者那里，由于对传统文化不熟悉、不了解，传统文化已经面临断裂的危险了。1995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九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提出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表达了对传统文化断裂危险的忧思：“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传统经典）是我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民族屡经重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的纽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能以游丝般的“未断”来掩盖普遍“面临中断的危险”这一事实。

三是对现当代文论建设成就的不同认识，以董学文先生为代表。董学文先

① 曹顺庆：《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② 熊元良：《文论“失语症”：历史的错位与理论的迷误》，载《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2期。

③ 高楠：《中国文艺学的转换之根及其话语现实》，载《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1期。

生从现当代文论,尤其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角度反对“失语症”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提法。尽管董先生也承认,“自从‘五四’运动确立了新学说对旧学说的话语优势之后,古代文论系统对现当代文学实践和理论探讨走向的实际影响是日渐式微了,它至多只是作为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进行理论批判、理论整合和自身创造的思想材料。近一百年来,真正左右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化步伐,真正构成学说内部结构性张力的是西方近现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①,但在他看来,“‘失语’一词武断地抹杀本已存在并仍在发挥作用的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内的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功能和意义,无论怎么说也是不够实事求是的”。他认为:“‘重建’论,固然有强调恢复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在文论建设上重要地位的积极性,但它的根本弱点和致命错误在于无视和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与中国社会和文学实践结合过程中已经形成的带本土化(民族化)特色的完整系统的合理性,全盘否定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建设做出的成绩。”^②这一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失语症”论者反对的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大力提倡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突出成就。近年来,“失语症”论者着力探讨文学理论的他国化规律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认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是重建中国文论的一条有效途径。中国化探索正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四是认为重建中国文论应以中国现当代文化、文论新传统作为出发点,以朱立元、赖大仁、陶东风等先生为代表。朱立元先生认为:“我国文艺学的建设和进一步发展应当从我们所立足的新传统出发,在从新时期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接着说’,而不是采取基本否定、重起炉灶的态度。”^④在他看来,“现在我们面前的传统不只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19世纪末以前的古代文化、文论传统;一个是百年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逐步形成的以‘现代性’为灵魂、融合中西所形成的现当代文化、文论新传统”^⑤。由于我们已有现代文论新传统的

① 董学文:《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思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② 董学文:《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思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③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523页。

④ 朱立元:《对文艺学学科反思的几点思考——兼谈对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现状的基本估价》,载《东方丛刊》2006年第1期。

⑤ 朱立元:《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与理论创新》,载《上海文化》2006年第6期。

“话语”，所以，不存在“失语症”问题。赖大仁先生是同意朱立元的意见的，他说：解决“失语症”这个问题的办法，无法依靠所谓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而只能以中国现当代文论为基础，充分吸纳中外文论中有用的东西，进行综合创新发展……如果抛弃了这种现代传统，所谓当代建构就更没有了依托^①。“新传统”（有学者称为“小传统”）说法是难以立足的。首先，“新传统”是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和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继承中发展起来的，这种所谓的“新传统”在中国并不是铁板一块，自“五四”运动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中西之争”的两条路线：有人主张以西学为主的西方化，有人主张以中学为主的中国化。“新传统”究竟是立足西方传统还是立足中国传统呢？如果不立足于中国自己的传统话语，那基本上还是尊奉以现代性为灵魂、以西方为主的西式话语。可见，“小传统”的说法是一种遮掩法，仍是想用以西方为主来遮蔽以中国为主，最终目的还是继续走“失语症”的老路。根本不用“改弦更张”，只要“接着说”就行了。其次，“小传统”是大传统的一部分，是大传统的延续，用“小传统”代替大传统是割断历史、无历史观的表现。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②因此，真正的传统只有一个，我们所要承继的就只能是大传统，而不可能是只继承小传统而不要大传统，承续大传统也并非“重起炉灶”，而是真正地“接着说”。李长之认为：“接着者，就是的确产生自中国本土营养的根深蒂固的产物了。……只有接着中国的文化讲，才是真正民族文化的自然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跳出移植的借去的圈子。”^③中西问题永远都是中西大传统的矛盾问题，不能以所谓的“新传统”来掩盖问题的实质，不能像阿Q那样，有了所谓的“小传统”就“得胜回朝”。陶东风先生也主张以“中国当今的现实”为主来重建中国文论。他在《关于中国文论“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一文中首先提出问题：“到底是以中国当今的现实为基础还是以中国的传统文论为基础来判断中国文论是否失语及如何重建，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我与曹先生的最大分歧所在。”紧接着，陶东风先生就开出了药方：“中国自己的当代形态的文论建构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它必然受到各种力量的牵制，利用各种可能的资源，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资源恐怕是中国的现当代的文化与文学现实。”原因在于“我们既不能照搬古代文论，也不能照搬西方文论来替代阐释中国现、当代的文论，这是因为它们都与中国的现当代文化与文学现实存在隔阂。西方的文论产生于西方的现当代文化与文学语境，这个语境与中国现当代文

① 赖大仁：《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与“同构性”问题》，载《文学前沿》2002年第2期。

②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页。

③ 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1—22页。